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2.017

#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体系构建

——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刘晓峰, 王晓慧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语言安全问题是语言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面对当前维护语言安全中存在的价值认知失衡、制度逻辑脱耦和行动机制不畅等诸多治理问题,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三位一体的语言安全体系,能够促进语言治理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的价值遵循,增进制度体系的耦合,提升治理行动的效能,推动语言安全的维护更加行稳致远。

**关键词:**语言安全;协同治理;价值重塑;制度耦合;行动优化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2-0146-08

语言无处不在,安全“国之大事”。语言安全业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早在1966年,“变异学派”领袖拉波夫(William Labov)摆脱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理论羁绊,主张把语言放到社会之中进行研究<sup>①</sup>,拓宽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他对豪根(Einar Haugen)的“语言不安全”<sup>②</sup>(Linguistic Insecurity)现象进行了理论探究,并对语言不安全指数(Index of Linguistic Insecurity)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规划<sup>③</sup>。2004年国内学者刘跃进首次明确了语言文字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并将其列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sup>④</sup>。近年来,在语言研究视域不断延展与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交互作用的背景下,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语言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从语言本体安全的角度,研究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保护,濒危语言拯救与防止语言生态危机出现等问题,如陈章太<sup>⑤</sup>、陈新仁等<sup>⑥</sup>;二是从语言关系安全的角度,探讨各种语言的接触与竞争中产生的语言歧视和语言秩序问题,包括语言权利、语言矛盾、语言态度与语言认同等问题,如戴庆厦<sup>⑦</sup>、赵世举<sup>⑧</sup>、张四红等<sup>⑨</sup>;三是从语言政策规划的角度,分析语言政策和规划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信息等安全领域的地

收稿日期:2021-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630060)

作者简介:刘晓峰(1973—),男,安徽巢湖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组织行为理论研究。

①Labov, W.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pp.1-23.

②Einar Haugen. Monograph No. 15. *Report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Round Table Meeting*.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63-69.

③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19-422.

④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

⑤陈章太:《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⑥陈新仁,方小兵:《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5页。

⑦戴庆厦:《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⑧赵世举:《破解语言关系和语言教育困扰的一个视角——再论着眼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全面语言素质观》,《中国社会语言学》2015年第2期。

⑨张四红,刘一凡:《中国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类型及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位作用与规划策略,如李宇明<sup>①</sup>、戴曼纯<sup>②</sup>、张日培<sup>③</sup>、沈骑<sup>④</sup>等;四是从语言应用安全的角度,阐明语言教育、语言服务和语言智能的开展及其衍生功能等可能引起的安全问题,如文秋芳<sup>⑤</sup>、张日培<sup>⑥</sup>等。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目前语言安全研究尚处于体系构建的前范式阶段,学者们多从语言安全的横向维度展开关于范畴主体、关键要素、研究范式的探讨,且偏重于理论向度。然而,随着语言安全研究领域的横向拓展,其呈现的丰富性、分散性、多元性必须通过纵向体系建构进行功能定位、秩序同构并有效衔接,比如语言安全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等。因为无论是从加强全球语言治理抑或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都需要加速构建理念清晰、科学完备、运行有效的语言安全体系。本文坚持实践导向,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一个“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学术进路,尝试探究语言安全体系的价值重塑、制度耦合和行动优化,以期不仅推动学术界对维护语言安全的理性认同,也促进与语言安全相关的单位和个人自觉行动。

## 一 语言安全:从问题到框架

语言安全与其他类型安全问题的交织互动、相互镶嵌的现实样态给维护语言安全带来新的治理情境、新的治理场域、新的治理挑战<sup>⑦</sup>。只有从问题出发,挖掘语言安全治理困境的根源,建立科学理性的分析框架,方能阐明语言安全体系的建构路径。

### (一) 语言安全的现实治理困境

#### 1. 价值认知失衡

语言自身是社会治理的工具<sup>⑧</sup>,自然使得人

们对语言安全存在一种工具理性的价值预设,然而工具本身的属性不完全是工具性或规范性的,关键是看行动者带着何种信念对其加以使用和讨论<sup>⑨</sup>。在治理实践中,人们往往沿袭惯性的工具价值思维,重视如何开发与利用语言资源,追求效率最大化,语言所隐含的人文价值和理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这种工具价值预设妨碍了人们对语言安全价值认知的全面理解。例如,在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实施框架中,语言成为美国全球博弈和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实用的工具理性跃然而出。与此同时,调和语言文字差异带来的文化和价值的矛盾冲突仍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体,大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对语言资源、多语主义、语言权利、语言冲突等关键问题进行各自的价值解读,全球语言安全所蕴含的整体性、公共性、类特性等价值意蕴,也正在被这种解读所虚化和分解。

#### 2. 制度<sup>⑩</sup>逻辑脱耦

在语言治理和语言规划的制度实践中,与安全相关的制度供给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应急性、滞后性、碎片化的样态。例如,在对“9·11”事件深刻反省之后,2003年美国众议院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直到2006年,美国正式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种“头疼医头”“应急治疗”“事后补救”的语言安全制度供给模式,使得语言安全规划难以形成完整的价值链、制度链和功能链。同时,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政府对其他制度主体协同不足,难以激发其他参与语言安全协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无法打开制度创新自主变革空间。历史上,语言问题常常与民族、宗教信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且大家共同遵守的语言避讳习俗、语言禁忌习惯等方面的

①李宇明:《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1期。

②戴曼纯:《语言与国家安全:以苏联语言政策为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年第1期。

③张日培:《国家安全语言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范式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参见沈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框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沈骑:《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安全规划的三大要素》,《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

⑤文秋芳,张天伟:《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模式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

⑥张日培:《语言政策视角下关于语言产业的若干思考》,《语言产业研究》2018年卷(创刊号)。

⑦方小兵:《语言安全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指标》,《辞书研究》2018年第6期。

⑧赵世举:《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功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⑨De Jong, Douglass, Sicilia, et al. "Instruments of Value: Using the Analytic Tool of Public Value Theory in Teaching and Practi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7 (5): 605-620.

⑩本文所指“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既包括语言安全相关成文的法律、法规、规则及合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语言安全相关不成文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

安全行为准则,即非正式制度。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国家和正式组织对语言安全的正式制度供给尚未有效覆盖和纵深推进,使得既有的、内生的语言安全非正式制度呈现出一种“零散的”活跃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积淀与累积的一些语言安全非正式制度内化于社会之中,一时难以改变,且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碎片化”治理的状态。

### 3. 行动机制不畅

传统的维护语言安全行动一般由国家政府通过建立语言规划和制度规范直接推动,然而这一模式根本无法应对语言安全治理环境和治理场域的复杂性、动态性,也无法调和和其他主体对安全多样化、个性化的诉求期盼。多元主体的博弈必然造成治理无序,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主体都在试图增加自身的话语影响力,希望其治理主张得到认同接纳;不同的主体亦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应对各领域多样化的语言安全问题,加剧了治理诉求的非理性与无序化表达,使得语言安全系统的行动目标很难连续一致、方式手段难以相互强化,无法释放系统的整体性动能。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及处置,目前尚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以覆盖语言安全风险发生前的预防识别、监测预警、应急协调、紧急援助和事后重建的全过程。

### (二) 原因分析

在维护语言安全方面出现价值认知、制度逻辑以及行动等系列治理的现实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一方面,语言安全治理的协同性不足,没有将协同理论和治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导致语言安全在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制度的协同性和治理系统要素协同性方面存在明显欠缺。客观地说,语言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在价值理念、制度结构、机制设计、技术支撑等方面各不相同,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主体都试图在增加自身的话语影响力,希望其治理主张得到认同接纳,也自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应对各领域多样化的语言安全问题,加剧了治理诉求的非理性与无序化表达,使得语言安全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形成、方式手段难以相互强化,无法释放系统的整体性动能。另一方面,当前语言安全制度存在整体性、协同性和融合度不足的缺憾。语言安全制度缺乏系统性的

整体建构,造成制度主体之间、制度架构之间以及制度执行动能方面缺少协同,从而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制度形态。与此同时,复杂动态的社会系统与内嵌其中的语言安全问题交互作用,对既有的语言安全系统运行规则产生着颠覆性的“破窗”影响。各主体所拥有的价值立场、制度规则、资源禀赋等要素均作为系统序参量参与语言安全系统协同演化进程,很容易形成系统各要素之间无序紧张的竞合态势,既缺少对系统外部环境的积极回应和现实关照,也无法应对系统内部语言安全风险叠加,从而导致语言安全在风险识别、调适、处置和恢复能力等方面显得无序低效。

### (三) 语言安全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语言安全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价值、主体、对象、规则制度等治理要素的复杂系统,其在参与主体、结构功能和过程机制方面呈现出典型的系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语言安全的治理主体多元化。语言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和政府,也可以是各类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当然亦包含每一个公民个体<sup>①</sup>。语言安全维护的本质就是上述多元主体在价值目标认同或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构建起理性的认知框架,做出合理的语言安全风险判断,促成协同意愿,采取“集体行动”,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二是语言安全具有要素子系统的协同性。各主体作为语言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资源要素禀赋和相应运行机制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系统集成就是要通过子系统的协作、关联运动,进一步揭示语言安全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相关性和互动规律,摆脱单一主体、手段和方式的传统局限,实现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联动、多领域互动,增强系统功能,从而协同增效。三是语言安全具有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性。语言嵌入社会大系统和安全大系统,使得其安全利益相关者纷纷提出诉求、参与博弈,并呈现出跨区域、跨领域、跨业界等动态演进的趋势,各系统要素之间的竞合状态或竞争关系会作用于语言安全系统的外部环境,促使语言安全风险在治理场域和风险样态上拥有极大的流动性、复杂性和随机性,某一地域语言安全风险会发生迅速跨越边界,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自由流动,触及社会系统空间的风险叠加;加之

<sup>①</sup>王玲,陈新仁:《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语言内嵌于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安全系统,使得语言安全风险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剧增,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影响系统开放性、自组织协调性,加剧协同治理的复杂性。四是语言安全行为共同规则的规制性。“语言安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日益成为一种语言行为。”<sup>①</sup>语言安全的行为规则是语言安全系统的序参量,作为序参量的语言安全主体权责界限、语言安全政策、安全教育监督等制度规范是多元主体重要连结纽带和行为规范准则,引导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分工合作、协同联动、共同应对,实现共治。

协同治理理论是在协同论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交叉融合形成的一个新兴理论,揭示了“开放系统”中“各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sup>②</sup>,其实质就是系统的主、客体相互协调,消除隔阂与冲突,实现目标、结构、机制和资源的共享与耦合,形成“集体行动”。目前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态治理<sup>③</sup>、应

急管理<sup>④</sup>、基层社会治理<sup>⑤</sup>和公共行政管理<sup>⑥</sup>等诸多领域,也充分显示了该理论对复杂动态多样的公共事务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回应力。协同治理理论与语言安全治理所具有的主体多元化、内部要素协同化、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性以及协同行为规制性等四个典型特征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也对解决当前语言安全问题具有现实针对性。

(四)“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面对维护语言安全的现实困境和障碍,必须对语言安全进行体系化的建构,由此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如图 1):其中价值是核心和旨归,重在阐明语言安全的多元价值及其关联;制度是逻辑和框架,重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的责权边界及治理结构;行动是治理过程和路径,重在明确语言安全系统内部要素相互关系和系统协同,优化行动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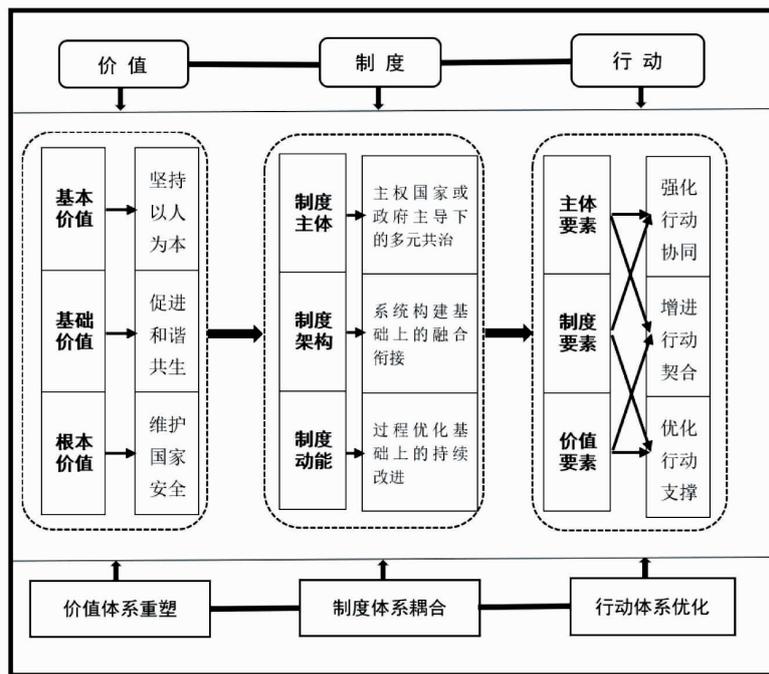


图 1 “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①沈琦:《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安全规划的三大要素》,《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

②李汉卿:《协同治理理论探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期。

③王家庭,曹清峰:《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由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引申》,《改革》2014年第5期。

④史晨,马亮:《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与智慧防疫——基于“健康码”的案例研究》,《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

⑤张树旺,李伟,王郅强:《论中国情境下基层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白坭案例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

⑥刘锦:《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构——以A市发改、国土和规划部门“三规合一”工作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0期。

## 二 语言安全的价值体系重塑

克拉克洪(Kluckhohn)将价值定义为显性或隐性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目标选择的看法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问题认知、目标设定、评估原则或标准、更新方式、执行手段等<sup>①</sup>。语言安全的治理价值意义在于将应对语言安全风险不确定性、流动性、复杂性的求助机制投射为国家、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集体意识”,在最大程度上诠释了人们对语言安全的愿景期待,也承载着多元主体对语言安全的诉求感知。

### (一)基本价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约瑟夫(Joseph Lo Bianco)认为,语言政策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声明,而是对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目标的支持<sup>②</sup>。语言既是人类沟通与交流最为重要的工具,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语言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习思维方式的进步变革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人们语言的学习、使用、传播和保护的权利不应以任何理由被剥夺和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语言安全的元价值,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语言安全的首要原则,将保障人的语言使用权、选择权和发展权作为其治理的基础价值。在英国上百年的殖民统治和文化输出中,其推行的“语言殖民”政策剥夺了殖民地使用母语的权利,在把殖民地的民族语言推向濒危和消亡之路时,也无情践踏剥夺了人们的语言权利和自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权利义务,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了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使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既有利于公民个人积极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也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 (二)基础价值:促进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

和谐是语言多样性的统一,共生是语言异质

性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不可分离的状态交织互动,全球语言体系是由7000多种语言组成且相互影响的复杂生态系统,语言安全系统的结构是由不同语言组成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系统的运行,影响着系统的功能。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保护语言的多样性,维持和谐共生的语言关系,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人类语言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也是维护语言安全的基础价值。其一,以“各美其美”守护各自的语言文化价值。目前世界上至少40%的语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濒危语言,注重提高社会大众的语言保护意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濒危语言和文化已刻不容缓。其二,以“美美与共”促进多种语言和而不同。世界因多彩文明而生机勃勃,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不同的语言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色和蕴含价值,语言的和谐共生正是世界多样化和民族多样性的一种映射,也是对“美美与共”价值观的承认与描绘。此消彼长、此存彼亡的单项思维和语言殖民、限制母语的粗暴行动只会造成语言系统的崩溃和语言文明的消亡。

### (三)根本价值: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目标

在国家的建构和治理过程中,语言作为重要的要素工具和战略资源均内嵌其中,其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等分别对应着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等诸多安全领域,因而语言作为国家安全要素、重要领域、安全工具和安全资源,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与此同时,语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语言安全正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因而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维护语言安全,既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实现过程。筑牢语言安全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是语言安全的根本价值所在。

<sup>①</sup>Kluckhohn C. *Values and Value-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88-433.

<sup>②</sup>Joseph Lo Bianco. *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7, pp.10-28.

### 三 语言安全的制度体系耦合

秉持不同价值理念的治理主体在实践中会产生不同的制度偏好和制度选择,其背后是潜在的不同制度逻辑<sup>①</sup>。实现制度耦合的实质是制度“集体理性”形成并趋于一致的过程<sup>②</sup>。然而面对目前语言安全制度缺乏整体建构且制度主体协同不足,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融合度不够的现实,协同治理下的语言安全整体性制度安排必须强化主体间信任联结,促进制度之间兼容衔接,激发制度执行动能。

#### (一) 主体耦合:主权国家或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

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共治和多主体协作以去除“政府中心主义”带来的治理失效和过渡集权引发的治理困境,国家、政府之外诸多不同的主体参与语言安全的协同治理,不仅强化了资源统筹和应急动员响应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冲突,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但是在治理实践中,国家和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主权和保障人民权益的核心价值使命,赋予其权威性和责任感是现代治理的一个基本前提。政府在维护语言安全中的主导地位 and 角色定位无疑被现代治理理论解释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政府要提升公信力和权威性,避免深陷“塔西佗陷阱”泥淖,主导语言安全制度顶层设计和远景设想,强化自身的制度权威和对其他主体的指引规范。一是政府要厘清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善运行机制,实现各负其责、规范运作、相互衔接、有效制衡。二是政府要加强对其他语言安全共治主体的引导规范,适时制定行为指引,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规范语言危机风险应对行为过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三是搭建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语言安全协同治理平台,以治理平台建设注入市场逻辑,释放对话、交互、合作的制度性空间,实现精准高效的公共服务保障供给,形成不同主体在维护语言安全过程中的协商联动机制。

#### (二) 架构耦合:系统构建基础上的融合衔接

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有机统一的制度安排是维护语言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保

证治理行为秩序化、规范化的核心。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性构建语言安全规划体系。在领域上应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生物等全领域,在层级上要囊括语言安全法律法规、语言安全规划、规章规定、办法细则等自上到下的完整制度层级。体系要横向到边,建立兼容性审核机制,避免制度之间的横向冲撞和交叉留白;纵向到底,分层对接,防止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真空地带。二是要强化制度融合,促进语言安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以“包容”的态度吸收语言安全非正式制度的“精华”,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强化非正式制度的合理性部分。另一方面,以“批判”的态度去除语言安全非正式制度的“糟粕”,并增强这些领域正式制度的供给力度,从而形成对这些“不良的”“零散的”非正式制度的挤出和整合。三是要注重语言安全风险治理的过程衔接,实现全过程的制度覆盖。语言安全的政策与规划要着力完善从语言安全风险预防监测、研判预警、应急处置到恢复重建全过程的基本制度体系,强化制度之间的过程衔接与呼应,重点是语言安全风险研判、风险预警、风险防范、风险处置、风险责任五项基本制度之间的协调联动,以完备的过程性制度安排保证行动连贯。

#### (三) 动能耦合:过程优化基础上的持续改进

维护语言安全制度的动能既有发端于不同群体形成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方式的外部压力,也有来自语言自身发展的内源动力。语言安全制度“使能”与主体“动能”的动力耦合主要集中在:一是要让更多主体参与制度的制定评价。比如在重大的语言安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听取语言专家对语言安全战略规划的意见,提升民主性、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保障国家语言战略的有效实施;二是要完善激励惩罚制度。通过激励制度和惩罚制度的配套为执行主体的行为提供正向刺激和反向限制,避免诱发语言安全主体抵制执行、逃避执行和偏差执行的行为选择,提升制度执行动能;三是要推进制度创新和持续改进。保持理性、开放、包容和适当的态度,推动语言安全制度的系统集成和创新发展。

<sup>①</sup>李忠杰:《全面把握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经济日报》2019年11月20日。

<sup>②</sup>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建立自洽性运行机制,提高制度执行的内生动力和执行效率。以语言安全制度执行情况反馈检验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激发制度创新的二次动能。

#### 四 语言安全的行动体系优化

改变目前语言安全系统运行低效的状态,必须协调优化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动谱系和交互运动,实现动态平衡、优化协同。在语言安全系统中,价值要素是内部环境,制度要素是外部环境,政府、社会组织、个人是行动主体,必须通过提升三要素联动的协同度、契合度、融合度,增大系统张力,优化结构功能,改进行动举措,提升治理效能。

##### (一) 凝聚多元力量:增进语言安全治理的行动契合

语言安全的协同治理是一个主体相互磨合、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也是多元价值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形塑过程,具有治理价值有限重塑的创新实质。面对同一语言安全问题,不同的主体会从自身的价值视角对语言风险及其形态、维度、强度进行感知与理解,形成不同的具有一定“倾向或态度”的价值判断,从而影响其治理行动策略选择和“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形成。语言安全治理行动契合的关键在于:一是凝聚价值共识,增进彼此价值认同。通过“价值性协商”和政府对于多元主体的教育引导,把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维护国家安全的价值理念作为对语言安全协同治理最高准则,内化为治理实践的基本规则,塑造语言安全价值的整体性诉求,形成“集体性”和“一致性”协同治理行动机制;二是共享治理成果,增进价值归属感。语言安全人人皆是受益者,大家对于安全和谐语言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致的,治理过程人人有责,治理成果人人共享,把语言安全的治理成效共享转化为价值目标,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是共同参与治理,增进价值实现的成就感。积极拓展不同主体参与语言安全协同治理的合理性和自洽性路径,优化调动多主体的人力智力和资源禀赋,通过信息互通、交换意见、感情联络、价值分享逐步增进语言安全协同治理价值实现的普遍认同。

##### (二)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语言安全治理的行动协同

维护语言安全需要多主体合力共治,必须在不同安全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寻求制度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以优化语言安全系统的行动协同。首先,应构建多元参与型语言安全制度决策模型。制度决策不再是自上而下垂直单向的过程,而是保障其他主体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调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提高制度认同度,增强行动自觉性,避免利益期望得不到满足的“消极”表现;其次,应强化语言安全制度从制定、执行到评估的动态闭环持续改进功能。引导语言安全的治理目标更加科学合理、问题识别更加客观精准,优化不同主体资源禀赋和信息承载的拥有配置,及时纠正语言安全制度执行的偏差,增进主体自我改进和彼此学习<sup>①</sup>。再次,应合理应用语言政策工具。在对语言安全问题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正确选择或综合应用各种政策工具,细化制度“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种类型的条款,合理搭配,优化组合,促进有效执行。

##### (三) 增强治理韧性:优化语言安全治理的行动支撑

制度要素与价值要素的联动决定了语言安全行动的边界与幅度<sup>②</sup>,制度就像语言安全的外部“硬性”标准,而价值类似于语言安全的内部“软性”约束,两者相互渗透、互动契合,软硬兼具,经纬交织,形塑着语言安全系统的治理韧性,强化着语言安全治理的行动支撑。一是最大程度上实现制度价值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在设计语言安全制度时要以共同的语言治理价值观为指引,使价值规范获得权威性和执行力,使价值观这一柔性约束的非正式制度转化为制度治理的有效手段,以价值实现的强烈预期对抗语言安全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避免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二是最大可能推动基本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的固化。对那些已经取得共识且极为重要的语言安全价值要素要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将价值要素的非强制性转变为以制度为依托的强制性,防止“信任性危机”,确保得以实施贯彻,以长效制度来吸收和化解语言安全系统的内外压力。三是最大

<sup>①</sup>谢微:《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与应用机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sup>②</sup>阙天舒,莫非:《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演化、联动谱系与推进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1期。

大限度地增加非传统领域语言安全的制度供给。对制度划定边界范围之外的语言安全问题仅靠价值引领去规范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增进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柔性促进不同主体参与治理的行动幅度,不断增加网络语言安全、数据语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供给,避免因制度缺位陷入治理困境。

### 结语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价值—制度—行动”分析框架,阐明了语言安全体系构建必须把握语言安全“人本价值—和谐共生—维护国家安全”的

价值使命,强化“制度主体—制度架构—制度动能”的耦合,从而凝聚多元力量,完善制度建设,增强治理韧性,最终形成“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三位一体的语言安全体系。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受社会大系统多重安全要素的持续涌现和起伏扰动的影响,现实中语言安全问题的生发土壤和治理情境呈现出更为复合、杂合与突变的特点,从而也导致了人们对语言安全风险感知、演进规律、治理情境和应对策略还缺乏具有“情境性”的深入分析和“体验式”的实践探索,这也是下一步完善该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和应运拓展的研究重点。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Securi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Value-Institution-Action”

LIU Xiao-feng & WANG 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nd language-induced security issues are unavoidable topics in language situation, and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action dimension of language governance. Facing the problems in maintaining language security such as imbalance in value perception, decoupling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oor action mechanism, it is urgent to introdu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build a “value-institution-action” language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multiple parties in language governance to follow common values, enhance the coupling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actions,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ecurity.

**Key words:** language secur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value reshaping; institutional coupling; action optimiz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